

“今天的一些青年,对历史的隔膜是太深了,他们不知道那时候的世界的情形……”

鲁迅先生的抗日



■陈大新

正当中国人民隆重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共识网”上贴出一篇王俊义写于2011年4月的文章《淞沪抗战时鲁迅在干什么?》,接着其他一些网站也作了转载,反响很大。文章认为:“鲁迅是文章的鲁迅,而不是英雄的鲁迅”,说“蒋光鼐和蔡廷楷的十九路军坚持淞沪抗战的时候,鲁迅正在上海,他不仅没有丝毫支持抗战的意思,并且显得有些懦弱和不可思议,甚至让人不可原谅。”……

历史的实情如何?我们该如何解读鲁迅先生的抗日?

不妨就从王的文章说起。王文说:“鲁迅日记记是一天不落的,但是淞沪抗战最激烈的5天,鲁迅的日记出现了失记的奇观。这5天失记,对于鲁迅的内心,或许也是一种煎熬。是记载日军进攻好呢?还是记载19路军抗击好呢?对于鲁迅,同样是哈姆雷特一样的难题。”

作者不知,日记的缺记其实大有讲究。“七七事变”后,钱玄同从7月19日到8月底就不记日记,钱称:“这四十日之中,应与《春秋》桓四、桓七秋冬同例也。”《河南程氏遗书》记载:“问:‘桓四年无冬,如何?’曰:‘圣人作经备四时也。如桓不道,背逆天理,故不书秋冬。’《春秋》只有两处如此,皆言其无天理也。”钱玄同不记日记是表达对日本人无天理的愤怒。鲁迅正有此意,而王俊义不识此典,并妄测鲁迅的心理。

王又说:“按照鲁迅的性格,自己的国家被侵略,他应该是杂文一样的犀利,而不是散文一样闲适。但是鲁迅选择了后者,始终没有一声谴责,也没有一声呵斥。”

鲁迅早在1931年底就有《“友邦惊

诧”论》这样有力的檄文。鲁迅写道:“只要略有知觉的人就都知道:这回学生的请愿,是因为日本占据辽吉,南京政府束手无策,单会去哀求国联,而国联却正和日本是一伙。”“‘好个‘友邦人士’!日本帝国主义的兵队强占了辽吉,炮轰机关,他们不惊诧;阻断铁路,追炸客车,捕禁官吏,枪毙人民,他们不惊诧。中国国民党治下的连年内战,空前水灾,卖儿救穷,砍头示众,秘密杀戮,电刑逼供,他们不惊诧。在学生的请愿中有一点纷扰,他们就惊诧了!好个国民政府的‘友邦人士’是些什么东西!”

众所周知,“一·二八”后,1932年12月鲁迅加入由宋庆龄和蔡元培首倡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其时国民党的政策仍然是打压反日爱国人士的,当然也有迫于日方压力的因素。1933年6月18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铨被当局暗杀。在杨铨入殓当天,鲁迅不顾朋友劝阻,同许寿裳一起前往万国殡仪馆,走时不带钥匙,实已做好牺牲的准备。这是因为鲁迅此时已受到当局的威胁,在报纸披露的“钩名单”上,鲁迅也在“该死之榜上”的事。事后,鲁迅以悲愤的心情写下一诗:“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这使我们很难认同鲁迅“懦弱”的说法。

1936年10月19日,鲁迅病卒,10月22日,数千群众向鲁迅致最后的敬礼,成为表达救亡与革命的宣示,也是对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的大示威,从此鲁迅也成为了“民族魂”。尊鲁迅为民族英雄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说到“专门把匕首和投枪扔向自己的同胞”的鲁迅,在“一·二八”期间“不正常”,我只能说,始终只以民族主义的视角看问题的人,是难以理解鲁迅情怀的。1932年

11月22日,鲁迅去北平辅仁大学演讲,提到“东北事变”,也提到“上海事变”即“一·二八”,人们以为鲁迅将有激昂的抗日演说了,然而鲁迅说的仍然是国人的劣根性,他说“昨年东北事变详情我一点不知道,想来上海诸位一定也不甚了然。就是同在上海也是彼此不知,这里死命的逃死,那里则打牌的仍旧打牌,跳舞的仍旧跳舞。”

鲁迅的忧国和反战,还可以从“一·二八”前后他写下的两首小诗中见其一斑。这两首诗都是写给日本妇女的,一首《无题》作于1932年1月23日,“一·二八”的前几天,是为日本东京女子大学教授高良富子写的一幅书法作品,其诗云:“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英雄多故谋夫病,泪洒崇陵噪暮鸦。”鲁迅感慨故国的灾难深重,忧患之情溢于言表。一首是《“一八八战后作”,写给日本反战的歌人山本初枝女士,诗云:“战云暂敛残春在,重炮清歌两寂然;我亦无语送归棹,但从心底祝平安。”鲁迅对日本国情是了解的,当时日本军人势力可谓一手遮天,对反战人士疯狂迫害,连对华侵略问题上持“稳重”态度的首相犬养毅也未能幸免。鲁迅这首诗表现了对反战友人回国的担心。

对于日本的政府和日本人,鲁迅是分开来看待的,林贤治在《鲁迅的最后十年》一书中谈到:“鲁迅知道,中国大多数人容易流于狭隘爱国主义。”“在他看来,日本就是两个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日本与人民的日本,战争的日本与和平的日本。”内山完造在《我的朋友鲁迅》一书中谈到:“他虽然讨厌日本政府,但是对日本人却非常亲切也很欣赏。”鲁迅印象中,日本人认真勤勉,他翻译过一批日本作家的作品,如厨川白村、鹤见祐辅、有岛武郎、武者小路实笃等等,

甚至于他文章的风格也是受到一定影响的。尽管如此,内山完造也分明感受到了鲁迅沉重的心情,他写道:“‘一·二八’事变以后,先生再也没有当着我的面说过日本的事了,我也无法说些什么,本来,政治和军事上的事情,我对谁也不曾谈及,包括先生在內。不过,我看过先生在文章里把日本骂得很厉害。他是个把政治和生活分得很清的人,还是一如既往地来我这里。”王俊义称内山完造是日本特务机关的文化特务,不足为凭。内山完造是鲁迅十分信赖的朋友,事实上内山书店很早就成为鲁迅和共产党的联络点了,红军将领方志敏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和遗书,就是通过内山书店转的。

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的一段时日里,国内出现以攻击鲁迅为时髦的暗波。而且,就是现在吧,对鲁迅的攻讦也并未停止过。孙郁在《鲁迅忧思录》里说,有人常常以鲁迅晚年身边有不少日本人,而骂鲁迅是汉奸,他认为,这自然是浅薄的看法。今天的一些青年,对历史的隔膜是太深了,他们不知道那时候的世界的情形。在三十年代,资本主义萧条的年代,各国的读书人和底层的职员,多是政府的敌人,用一句老话说,是无产者没有祖国。日本、中国、韩国的知识分子在那时是心心相印的,并非今天的民族主义盛行。我们今天评价人,是以国家、民族为线的,而那时是以阶级为出发点的。当小林多喜二被枪杀的时候,鲁迅写信抗议,是典型的左翼举动。

确切地说,自东北沦陷后,鲁迅先生始终坚持于抗日的战线上,他死于抗战全面爆发之前,在这种危难之时,人们尊鲁迅为“民族魂”是很有深意的。

十年磨出《新茶经》

■见习记者张泽媛

唐代茶圣陆羽的《茶经》,享誉中外。近日,经过10年酝酿,6年精心撰写的《新茶经》出炉,在业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

浅绿色的封面,一壶清茶正冒着热气,仿佛缕缕茶香扑鼻而至。在《新茶经》中,我们可以了解茶之源流、传播、种植、品类、加工、器具、品饮、诗文、艺道、功效、经贸以及科教等,共12个篇章,其中前10个篇章与《茶经》框架一致,后两个篇章依据现代社会的发展现状,属于新增内容,与时俱进,更接地气。

与《新茶经》有关的名字都是业界泰斗级的。主编刘枫是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副主编程启坤、姚国坤分别是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名誉副会长和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编委王旭峰是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茶人三部曲》作者、浙江林学院茶文学院院长教授……

2005年,时任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会长的刘枫,认为自己有责任重新解读只有7000多字的《茶经》:“《茶经》中所记录的农耕文明茶事象,在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进步过程中,已被新的茶叶文明形态逐渐取代置换,需要新的记录、总结、提炼和归纳。”

2008年,撰写《新茶经》成为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的重点项目。刘枫约请了宋少祥、程启坤、姚国坤三位同事兼茶友,经过无数次讨论,足迹遍布国内外茶园,2009年专家们开始分头动笔,2010年初稿完成,字数48万。此后经历6次统稿,字数“砍”到26万。

“刘枫主席看了1个多月,写了10多页修改意见,连一个标点都不放过,最后字数剩下24万。我们要用科学的态度、严谨的逻辑、凝练的语言,使其成为经典性的茶经。”程启坤回忆漫长的“磨剑”过程。而姚国坤说,“平常出书,我们一般只校对两遍。但这本书,我们来回回校对了对6遍。”

柴米油盐酱醋茶,琴棋书画诗歌茶。喝茶、品茶、评茶、写茶经,都是一种境界。对于初学者,《新茶经》仿佛打开了一扇茶文化的大门。而对于专业的茶文化的工作者,《新茶经》无疑为之提供了内容详实的资料、文献,对研究有很大的帮助。



不是只有西南联大,也不是只有蔡元培

抗战烽火中的大学应整体被追忆



他们虽身处战乱,却个个意气满怀。

■赵青新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乱世烽烟,弦歌不辍。那是个苍黄翻覆、陵谷变迁的大时代,包括北大清华南开在内的中国大学,为保存文化薪火而长途跋涉,南渡内迁。八年的长期坚守,任它雨打风吹,掩不住书声琅琅。这一段历史是中国大学精神的最好体现。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认为,集体记忆可用以重建过去的意象,在每一个时

代,这些意象都是与社会的主导思想相一致的。

陈平原长期从事中国大学史研究,治学严谨,他说,“轶事不等于史实。”“神话”寄托了人们的情感,但尊重历史最好的态度,仍应该是说实话。”这是陈平原撰文的一大原则。叶圣陶和丰子恺都曾以日记形式记录逃难的艰辛和大学被炸的惨状,区别在于,丰子恺的《宜山遇炸记》系战后整理发表,而

叶圣陶的《乐山被炸日记》质朴无文,更接近原始状态。因此陈平原在近作《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中引用的是后者。但这并不是说陈平原就否认文学类作品的价值。《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第三篇“当止诗句记飘蓬”探讨抗战中西南联大教授的旧体诗作,陈平原认为,这些诗作不仅道出了当时知识分子的心声,同时也是他们的精神底色。即使其中有文学的夸饰,或许不完全符合事实,这种表达的本身及其中透出的心态转折,同样是历史研究必须面对的对象。

梅贻琦、陈寅恪、闻一多……有一些名字特别闪亮。但我们不能因他们的杰出而忽视掉其他人的付出。谈起北大校长,我们首先想起蔡元培先生。陈平原研究后指出,蔡元培的意义被无限夸大了,以至无意中压抑了其他功不可没的校长,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蒋梦麟。蔡元培管理北大并非全无过失,最大的败笔就是过分强调以德治校而忽视制度建设,造成北大纪律的自由松弛,作为继任者的蒋梦麟花了很大气力来夯实蔡元培奠定的老北大基本品格。西南联大期间,张伯苓因年高留重庆,蒋梦麟常驻重庆却引来不少争议。我们总是谈论梅贻琦的贡献,却忽视了重要的一点:三校合作,最忌讳政出多门。陈平原通过翻检资料,于1945年9月6日汤用彤致胡适的信件中,找到了汤用彤从前和蒋梦麟的对话实录,为我们如今重新认识蒋梦麟提供了依据。蒋梦麟在重庆处理诸多物资事宜,他的退让其实是梅贻琦执掌西南联大腾出了空间。汤用彤说:“此中具见先生之苦心,有识者均当相

谅。”我曾读过历史学家范泓的著作,说蒋梦麟的人格魅力不如蔡元培,学问不如胡适,但办事却比他们两人高明,兼容并包而又注重建设,坚持原则又能适当放权,行政管理上很有智慧。如今两厢印鉴,想必所言非虚。我们认识历史人物,要有全面辩证的看法,而不可轻下结论。

同样道理,西南联大已成佳话,但历史不能忘记其他大学。《南方日报》曾经为中山大学叫屈:为什么大家都只讲联大,中

大呢?确实如此。从抗战爆发到1941年底,大约八成大学迁移到内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有一些大学关闭或者内迁。他们同样在颠沛流离中坚守气节,他们的故事同样可歌可泣。目前对其他大学的研究有待深入,一方面是因为联大集结的人才最多,另一方面是因为联大人的文章记录最多,其他学校的史料乏善可陈,因此缺少研究的对象和方向。历史研究需要建立在事实基础之上,在找到更多的、更合适的解读方式之前,我们首先需要牢记,“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应当作为一个整体被追忆,而不是仅仅局限在一所大学,甚至几个人的“神话”。



1944年秋,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朱自清(左一)、罗庸(左二)、闻一多(左四)、王力(左五)欢送罗常培(左三)赴美讲学时的合影。看到这张老照片,陈平原先生笔端饱蘸深情地写道:“联大有什么值得骄傲的?联大有精神:政治情怀、社会承担、学术抱负、远大志向。联大人贫困,可人不猥琐,甚至可以说‘器宇轩昂’,他们的自信、刚毅与聪慧,全都写在脸上。”这张老照片,“堪称抗战中意气风发的中国读书人的象征”。(杨彬)